

在持续的“同意”中实现并巩固无产阶级 政党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性” ——葛兰西党建思想对信息化时代党群关系的启示

潘西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在葛兰西那里,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获取实际就是借助非强制性的教育方式、智识和道德引导方式获取其他社会集团及社会成员积极认同与自觉服从的过程,是一个重新塑造民众文化价值观的过程。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与有效性的实现,均以民众持续的“同意”为基础、离不开民众的参与、新闻媒介的宣传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教化。葛兰西的这些思想对信息化时代党群关系的处理不无裨益。

关键词: 安东尼奥·葛兰西; 同意; 领导权; 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 D054; 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5)05-0010-05

To Realize and Conso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ltural Hegemony of Proletarian Party in the Continuous “Consent”

——The Enlightenment of Gramsci's Party Construction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PC and Masses in the Information Era

PAN Xihua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Gramsci, the acquisition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cultural hegemony is actually a process to get active endorsement and conscious obedience from other members of the social group or society and to reshape the cultural values of people by using non-compulsory education, intellectual and moral guiding. The acquis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cultural hegemony are based on people's continuous “consent”, and are inseparable from people's participation, media publicity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organic” intellectuals. Gramsci's thoughts are helpful for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PC and masses in the information era.

Key words: Antonio Gramsci; consent; hegemony; effectiveness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袖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在探索意大利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意大利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颇具“文化”特色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强调了持续的“同意”对实现并巩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有效性”的重要意义。葛兰西的这一思想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对后世也很有启发意义。

收稿日期: 2015-02-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研究”(编号: 13&ZD009)

作者简介: 潘西华(1977-),女,山东济南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外马克思主义。

一、在持续的“同意”中构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社会心理基础

葛兰西十分注重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心理基础的建构,尤为强调无产阶级与同盟阶级以及民众之间阶级统一性的建构与培育。葛兰西认为,这一阶级统一性是建立在持续的“同意”基础之上的,特别是那种“自愿的”、持续的“同意”。

在葛兰西的思想体系中,“同意”被归结为一种心理状态,包括对社会政治制度或秩序等某些重要领域的认可,它是与大众日常生活中未加批判的“常识”直接相连的,是被民众自觉信奉与服从的。^{[1] (P38)} 虽说“同意”在概念描述中被理解为永远主动的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同意”都是自愿的、民主的。葛兰西进一步将其细分为“自愿”的同意与选举创造的“同意”。“自愿”的同意是一种基于对“常识”的信奉而形成的、不违背自己意愿和良知的、心甘情愿的“同意”,其不同于民众的“同情心”,是一种积极的“认同”,是民众达到一定阶级觉悟后自觉的拥护。比较而言,选举创造的“同意”则是屈服于国家选举结果的被动服从,并非出于民众本愿。

葛兰西还在“完整的”国家思想的基础上,从两种“同意”所处的场所加以区分。在葛兰西那里,完整的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政治社会主要是由政府、军队、警察、法律等国家机器构成。市民社会则成为一个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是包括教会、学校、新闻机构、文艺团体等在内的、制定和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民间机构。葛兰西认为,选举创造的“同意”主要发生在政治社会,而“自愿”的同意则主要发生在市民社会。因为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的活动是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在习惯、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达到客观的结果”,^{[2] (P191-192)} 即民众对“常识”(日常生活中未加批判的、包含一定真理成分的“世界观”)的信奉与自觉服从。因此在某一时代或某些民众集体中,“常识”经由总结形成的模糊和零散的思想轮廓就得到了民众的信奉,对其言行具有约束力。比较而言,发生在政治社会的、由选举创造的“同意”就没有这种优势,因为民众“主动性当中的‘自愿’因素是不可能用任何别的办法激励起来的”。^{[3] (P90)} 葛兰西认为,这种选举创造的“同意”并非发自民众内心,不具有持续性。

基于对“同意”的区分,葛兰西强调,政党只要顺应民众经验性“常识”的要求,就很容易在舆论运动或舆论趋势中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愿的“同意”与自觉服从,继而获得文化领导权。因此,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须重视市民社会里民众习惯等“常识”的作用,并以系统的、融贯的、批判的思想和道德变革方式对已有的、较为原始的“常识”加以引导和改造形成“健全的常识”,进而在“运动的平衡”中培育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葛兰西认为,这是一个在事实层面逐步展开、动态变化的过程,同样需要不断的建构与维持。^{[4] (P32-33)} 只有这样,方能持续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构建社会心理基础。

二、在持续性的“同意”中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性”

在葛兰西那里,“hegemony”的意思是“领导权,占有优势的影响或有权威”,即领导权的有效性。但这个领导权“有效性”的实现,既不存在也不希望使用暴力。相反,它的目标是实现更深入更积极的民主,是建立在不断获取民众持续的“同意”基础之上的。

第一,就领导权自身的合法性而言。葛兰西认为,一种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存在,不是依靠外在的武力强制来获得(即便是获得也不会巩固),“国家的前提是同意而且要求同意”。^{[2] (P218)} 无产阶级政党要夺取国家政权就必须首先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指出,文化领导权的提出是以获取与巩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为出发点与旨归的。葛兰西虽不否认政治统治(强制)作为一种行使政权的方法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要性,但他更强调借助非暴力、非强制的文化领导权所产生的权威。^{[5] (P218)} 认为它不仅能为政权存在的政治合法性赢得普遍认同、同意与支持,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可为领导权的存在提供深层次的道德合法性支持。因为在他看来,领导权的发展“必然引起和暗示智力的统一以及符合那种克服了常识并成为批判的(哪怕暂时还在有限的范围的)现实观的伦理”。^{[2] (P16)} 将道德价值因素作为重要内容融入文化领导权思想是葛兰西的特色,这一做法也极大地增强了文化领导权的说服力与领导力。

第二,就领导权所产生的威慑力而言。自古以来,“权”就是权力、权威的象征。葛兰西所倡导的“文化领导权”概念中的“权”所具有的威慑力,不是直接采用暴力、强制形式获得的,而是借助非暴力的领导方式间接转化而来的“强制效应”。在葛兰西看来,作为掌权者的统治阶级若依靠强制或武力迫使从属阶级服从,这种统治方式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可能引发“统治”危机,危及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与之相反,借助“智识与道德改革”方式对民众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在顺应民众“常识”需求的基础上引导民众建立“健全的常识”。依靠民众对“健全的常识”的信奉与自觉遵从,文化领导权便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转化为一种非强制性的权威、威慑力。受马克思提出的“民众信念”往往具有物质力量的思想的影响,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经由“智识与道德改革”方式引导民众形成的“健全的常识”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抽象观念,而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力量,它不仅可以直接形成政治斗争,而且是一种媒介物,通过它可使广大阶层团结成一股革命力量,^{[6] (P232)}进而凝聚成社会进步的变革力量,其威慑效应也是非常强大的。正是因为获得了民众“自愿的”、持续性的“同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有效性”方能实现并得以巩固。

第三,从文化领导权“有效性”的获得与巩固的过程来看。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性”不是一种“给定的”和持久的事件状态,是需要不断赢得和保持的动态发展过程。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与巩固的过程,就是借助不断协调无产阶级同社会其他集团、民众之间利益关系平衡的过程中持续获取“同意”的过程。随着不同社会集团的新旧交替,无产阶级政党同他们之间旧有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就需要再去构建新的平衡。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不断寻求自身同社会其他集团和民众之间关系的“动态的平衡”中,方能获得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性”。

三、在大众文化所提供的持续的“同意”中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性”

葛兰西注重发挥大众文化在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性”过程中的作用。在葛兰西那里,文化所包含的“不限于直接政治控制的事务,而试图描述一种更为普遍的支配,其中包括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看待世界、人性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特定方式”。^{[3] (P36)}更为确切地说,文化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能够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的范畴。

葛兰西在反思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执政之道时,就意识到统治阶级借助其掌握的舆论工具甚至政治机构,封杀无产阶级的言论,维护其对民众的“文化领导”的方略。葛兰西分析指出,对于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来说,在政治社会实行武力强制的统治方略的同时,也注重在市民社会借助大众文化的宣传对民众实行“教化”,或者用颇具迷惑性的民主方式和权力的适当让渡,在潜移默化中将自己的世界观“移植”到群众的头脑中,在市民社会获取部分被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所蒙蔽的普通民众与工人阶级的“同意”。进而在市民社会为自身打造了最后的、顽固的也是极为“有效的防御工事”。

葛兰西强调,以实践哲学(鉴于监狱环境的限制,葛兰西用实践哲学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获得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性”,就必须为“争取新文化而斗争,即是为争取新的人道主义、批评风尚、意见和带着美学或纯粹艺术的批评的世界观而斗争”。^{[2] (P457)}这就需要发挥大众文化的批判作用。在葛兰西那里,大众文化作用的发挥,不仅需要构建新的新闻机构、刊物等作为传播介质,也需要发挥“有机的”知识分子的作用。

新闻媒介 在葛兰西那里,新闻媒介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最明显、最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或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每样事物,如图书馆、学校、各式各样的协会、俱乐部,甚至还有建筑以及街道的布局和名称”,^{[7] (P84)}也包括“出版社(它具有一套显性、隐性的计划,并存在特定的倾向),党报、科学的、文学的、哲学的、流行的等等的每一种期刊,甚至包括郊区布告栏里各式各样的刊物”。^{[7] (P84)}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性”,就必须创办这样的新闻媒介机构来领导大众文化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葛兰西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领导意大利早期工人运动时,葛兰西就曾参与创办了《新秩序》周刊,后来改为了《新秩序》日报。这一刊物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

主义思想,揭露意大利社会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妥协政策。再如《团结报》,也是意大利共产党团结广泛力量、指导群众、宣传并推进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工具。

“有机的”知识分子 大众文化批判作用的发挥,除了新闻媒介的构建之外,也离不开“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教化作用。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点,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两种类型。^{[1](P39)}前者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从前一种经济结构中脱胎出来的,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后者则是随着历史上任何一种代表新生产方式的阶级产生而产生的,与造就他们的阶级之间“有机的”、“直接的”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群体。但不管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还是“有机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传播本阶级意识形态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被誉为统治阶级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2](P425)}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要想获得与资产阶级大众文化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培育出本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并且要拓展其“教化”范围,将其指导、组织、教育、治理的功能由党内扩大到整个社会,这样不仅有助于在大众文化批判斗争中促进“传统的”知识分子向“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转化,也有助于对社会成员的教化,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与巩固赢得更多的“同意”。

四、在持续的“同意”中维护信息化时代党的领导权的“有效性”

葛兰西重视建构政党与阶级之间的有机关系,强调在“动态的平衡”中实现并巩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性”,突显了获取舆论民意的重要性、民众参与的重要性、新闻媒介宣传与“有机的”知识分子教化的不可或缺性。这些与信息化时代我们党处理党群关系的着眼点有一定契合之处,不无启示意义。

获取舆论民意的重要性 在信息化时代,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民众获知信息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样化,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已然形成了全天候的立体格局,这种新媒体的信息化发展为民意的阐发、舆论的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支持。但另一方面也为各种错误思潮、虚假言论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包括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在内的错误思潮,通过不同途径不断向我国渗透;包括“疆独”“藏独”“台独”^[8]等民族分裂主义对我国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也形成不小的威胁,很容易混淆视听,影响或误导群众的言行。这种舆论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我们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政治更加民主、信息更加公开、透明,敢于和善于接受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在互联网这一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我们也应像当年葛兰西所提及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式那样,要借助一种“分子”方式,“毛细血管似地”、“一点一滴地”“渗透”到错误的思潮与言论中,彻底瓦解并取而代之,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此同时,还应积极构建现代化的立体传媒体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强化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增进社会共识。促使个人、集体在做出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时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保持一致,维护我们党的领导权的有效性。

民众参与的重要性 调动人民主动参与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之一。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与巩固不是作为统治阶级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文化操纵”过程,而是一个在社会从属阶级及民众积极参与的过程中,统治阶级不断获取他们持续的“同意”、认同的过程。^{[1](P38)}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前提与旨归的民族——人民“集体意志”的形成离不开民众“自愿的”同意,“市民社会”各种舆论形式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有机的”知识分子“教化”职能的发挥也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简言之,在葛兰西那里,民众能否参与及其参与程度与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能否获得及其稳定程度是成正比的。

在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的今天,调动人民的主动参与性显得尤为重要。民众不仅是先进信息技术成果的受益者,而且也是参与创造者。特别是在庞大网民群体出现的今天,随着群众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网民群体习惯于借助网络等交流平台,主动选择自己关心的话题(其中不乏国家、政党以及社会热点问题)根据自己的立场进行交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在确保民众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积极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提高信息发布的及时性、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

力。在积极保障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的同时,充分发挥民众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舆论监督作用。与此同时,还应及时收集整理群众的各种意见建议,全面、快捷地听取群众呼声,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智慧得到充分发挥。

新闻媒介的宣传作用 新闻媒介是大众文化建设的重要物质载体。当前,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已带来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和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新兴媒体发展之快、覆盖之广超乎想象,这给传统媒体带来很大冲击。因此,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刻不容缓。我们党应积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在品质上追求专业权威、在传播上注重快捷精简、在服务上注重分众化互动化、在展示上实现多媒体化。促使融合后的媒体继续成为主流媒体,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9][P10]}2014年8月,《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这一传媒新政的实施,必将为新媒体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机遇。

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 葛兰西十分注重发挥“有机的”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有效性的获得与巩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设想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作为“集体的知识分子”。在信息化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同各种错误思潮、理论作斗争,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积极发挥理论界、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知识分子的培养、使用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在信息化时代,正确解决社会矛盾、正确处理党群关系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随着网络、微博、微信的普及应用,社会突发事件的曝光率提高,社会事件或社会矛盾可能会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就被疯传,社会舆论可能会被误导。这些社会事件或矛盾的及时澄清,离不开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发挥。网络“公知”或“大V”应借助自身的社会影响力,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以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此外,有效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的融合发展,同样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新兴媒体的建设中,要转变用人机制,建立统一的人才管理体系,加大新兴媒体内容生产、技术研发、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引进力度,优化人才结构、统一调配使用。要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探索媒体融合发展条件下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有效办法,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9][P12]}以利于大众传媒宣传作用的发挥。

葛兰西在持续的“同意”中实现并巩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有效性”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其突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性、先进性、有机性和动态发展性,这对信息化时代我们党处理党群关系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借鉴葛兰西思想的合理之处,在“运动的平衡”中不断构建党群之间的有机关系;在不断获取民众“自愿的”、“持续的”同意中,进一步巩固并完善我们党的领导权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胡杰华,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J].理论视野,2008(5).
- [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3][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M].陈越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 [4]潘西华.在“运动的平衡”中建设有机政党[J].新视野,2014(6).
- [5]潘西华.“文化领导权”与马克思主义现时代的生命力[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1).
- [6]毛韵泽.狱中札记[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
- [7]转引自庄曦.从《狱中札记》看葛兰西思想对媒介研究的几点启示[J].文教资料,2008(2).
- [8]韩庆祥.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伟大斗争”[N].人民日报,2014-07-23.
- [9]刘奇葆.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J].党建,2014(5).

(责任编辑:郭荣华)